

第三章 兩漢文學

第一節 偉大的散文家司馬遷和傳記文學

一 司馬遷的生平和時代

司馬遷，字子長，生于漢景帝中元五年（公元前一四五）左馮翊夏陽（陝西韓城）人。夏陽的北面有龍門山，瀕臨黃河，山峽的險峻，河流的浩蕩，即予童年的司馬遷以無限的啓發。他自己說是龍門人，大約因為龍門的名子見于夏書，較夏陽要古些，所以乐用龍門这个名字吧。他的祖父司馬喜曾經得到「五大夫」的爵位。父親司馬談在武帝建元、元封之間做了太史公（大史令），曾著有論六家要旨。這是司馬談对上古学朮的总評價，司馬談在这篇論文中，把上古的学朮分为六派，即陰陽、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，司馬談是崇尚道家的，所以对陰陽、儒、墨、名、法五家都予以中肯的批評，有优点也有缺点，而对道家則完全贊許；以为各家的缺点是在各执一隅，而不能灵活的运用，只有道家沒有这种毛病。首先是道家能采取各家的長处，所謂「因陰陽之大順，采儒墨之善，撮名法之要。」其次是道家对待事物是有發展观点的，所謂「与时迁移，应物变化。」这篇文章，并不是一篇純粹的学朮論文，而是针对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朮的政治批評。司馬迁后来虽然对于孔子是崇拜的，对于六藝也有充分的了解，然而他的根本思想則是道家，这自然是受了他的父親的影响。

十歲以前，曾經雜在農民和牧童的中間，「耕牧于河山之陽，」所以對於民間生活是有了解的。他自己說：「十歲誦古文，」恐其十歲那年他跟着父親到了長安的。而漢書儒林傳說：「司馬迁亦从安國（孔安國）問故（古文尙書），」大約也就在这个时候。武帝元朔三年（前一二七），他二十歲，开始了大江南北的旅行。这次他由長安东行，沿淮水順流而下，到了淮陰，訪問了韓信貧窮的故事，又憑弔了韓信的墳墓。由淮陰南行，渡大江，登江西的廬山，「觀禹疏九江。」又东遊浙江紹興，登縣南的会稽山，探禹穴，訪越王勾踐的古迹，有名的臥薪嘗胆的故事，后来采入史記了。既看了禹的史迹，又横越浙贛而远至湘南的宁远縣，登九疑山憑弔舜的遗迹。再順流北下，到了長沙，在湘江汨罗之間，偉大的人民詩人屈原和早熟的文人賈誼的遗迹使他抵個不忍去。于是再北上，先遊了姑苏和五湖，訪問了闔廬夫差的旧地。就到了儒家的根据地齐魯，他在这里勾留的时间很長，一方面欽慕孔子的遺風，一方面学习鄉射的礼仪，和觀看孔子的庙堂与車服礼器。他在深味都魯的儒風之余，观察兼及于齐，不过他对于齐的整个印象的獲得，却还是以后扈从封禪的事。經過齐魯之遊以后，他曾困于都薛彭城，薛在滕縣东南，为孟尝君所封的地方，后来他在孟尝君列傳贊中說：「吾尝过薛，其俗，閭里率多暴桀子弟，与都魯殊。」彭城是現在的徐州，丰，沛在其北，宿迁在其南，秦末政治舞台上的兩大要角刘邦和項羽，前者是沛丰邑中陽里人，后者是下相（宿迁）人，其他漢初人物如蕭何是沛丰人，曹參、周勃、樊噲、夏侯嬰都是沛人，盧籍是刘邦的同里，張良虽不是这里人，早年也曾在下邳亡匿过，通过司馬迁的四处采訪并和地方遺老的談話，这許多要人的微賤时的事迹便成了他

后来著史記的原始材料。离徐州即西返长安，在归途中訪問了大梁（开封），这是战国时魏的都城，他在这里搜尋了信陵君的故事，信陵的故事中最精彩的是执轡迎夷門監者侯嬴，所以司馬迁說：「吾过大梁之墟，求問其所謂夷門，夷門者，城之東門也。」（信陵君列傳）他这次大旅行，我們不敢說他就存心作史記，然而他的歷史興趣必發達得很早，也就因为这种兴趣鼓舞他漫遊天下了。他这次所遊歷的地方很多，經過的時間一定有好几年才回到長安。

他回到了長安以后，大約在元朔六年（前一二三）左右吧，他开始了仕宦生活，做了郎中。郎中是一种近侍的官，平常沒有一定的工作，有事則奉命出使，或扈駕巡行。元鼎五年（前一一三）他三十四歲了，仍做郎中。这年，武帝到雍（扶風）祭五時，从此又西行，越过了隴山，到了甘肅的平涼以西，登了崆峒山。据說这是黃帝所登过之处。更西行，到了祖厉河岸，（甘肅会寧一帶）才折回長安，司馬迁無疑是會跟着武帝到过这些地方的。他在五帝本紀贊中說「余尝西至崆峒，」他就在这里，重溫了一番有关黃帝的傳說。

次年武帝为了所謂「經營西南夷，」于是派司馬迁出使巴、蜀、滇中。他从長安經過漢中到了巴（重慶一帶）蜀（成都一帶）和邛笮，（西昌一帶）并到了昆明。在他的說服之下，西南各兄弟民族和漢人取得了較好的联系了。而在他本人，則这次旅行促成了他的「列傳」的產生。

漢朝封建統治最巩固的时代，由于國勢強盛，便迷信神仙，祭祀天地，滿想自己能永远坐着皇帝的宝座，于是封禪（在泰山上祭祀天地）就成为当时國家大典。这种劳民伤財的玩意儿，司馬迁差不多每次都参加的。

元封元年（前一〇）正月，武帝举行了大規模的封禪，大隊人馬到了洛陽的時候，原跟着的司馬談却病倒了，这时司馬迁正从巴、蜀、漢中奉使归来，在洛陽見到了他的父親。他父親熱切地把手，流下泪來，把自己的心事告訴了他，把自己不得参加封禪的懷喪也告訴了他，并要他怎样尽孝道，繼承自己的事業，撰著歷史，他在感動之中，低下頭哭了，他給父親以安慰：「小子不敏，請悉論先人所次旧聞，弗敢闕。父親終於这年死了，他在怀念与哀思中，接受了作一个大歷史家的使命。

司馬迁因为职务关系，扈駕东行，到了海上。这年四月，大隊人馬由海上回到泰山，举行了封禪大典。他虽然扈駕参加这种大典，而心里却認為是荒唐的，所以他在封禪書里極尽諷刺笑罵的能事。

因为封禪而有了到海上的机会，这使司馬迁对于齐才有一种更总括的了解，所謂「吾适齐，自泰山屬之琅琊，北被于海，膏壤二千里，其民闔达多匿知，其天性也。」（齐太公世家贊）沒有實地的經驗，是不能說得这样親切的。此外史記中关于齐人的許多載記，如騶衍，公孙弘以及許多方士如少翁、欒大、公孙卿、丁公等，也一定是由于在实地旅行中所得的事实而着筆的了。

这年五月，封禪大隊，由海上而到了現在的錦縣承德一帶，再經五原，回到甘泉，他們这一万多里的旅行，于是結束。司馬迁从前遊了中原和东南，遊了西北和西南，就是沒有觀看海上景色和塞外風光，这一次都观看了。

以上漫遊大江南北，奉使巴蜀滇中，和这次扈駕封禪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旅行。

元封二年，（前一〇九）大規模封禪的第二年駕，他三十七歲了，又有扈駕負薪塞河之役。因为这一年黄河在瓠子（河北濮陽縣南）决口，人民的生活很苦，于是武帝率領百官去塞河，命百官都帶了薪柴，加上竹片插起來，然后把石和土填在这里面，去防塞。河塞好了，武帝并作有「瓠子之歌。」司馬迁在这一次又参加了的。这就組成了他日后「河渠書」的一部分材料。

元封三年（前一〇八）他开始做太史令。在司馬談死的时候，就已经告訴过他：「余死，汝必为太史，」这事现在果然实现了。他做了太史令以后，当然要搜集史料，所謂「一軸史記石室金匱之書，」所謂「百年之間，天下遺文古事，靡不畢集于太史公，」他的精神生活比以往是更丰富了。

可是他除了研究这些文化遺產之外，仍有随从巡行的事情。元封四年，（前一〇七）他扈从封禪，北过涿鹿。这次的路綫，是先到了雍祭五時，又通回中道，出了蕭关，繞了一个大圈子，經過独鹿鳴澤（前察哈尔涿鹿）到了山西的恆山，繞轉回來。到了这时，司馬迁真可以这样说：「余尝西至崑崙，北过涿鹿，东渐于海，南浮江淮矣。」（五帝本紀贊）

元封五年（前一〇六）他四十歲了，又跟随着武帝南到九江。先到南郡，又到九疑山祭虞舜，又登当时号称南狱的灑天柱山（安徽的霍山）然后自尋陽（江西九江）浮江，武帝在江中發現了一只蛟，便親自把牠射獲了。南巡完了，武帝便又北上，到了琅琊和海上，增封了泰山，司馬迁自然也跟着走了一大遭。

太初元年（前一〇四）司馬迁四十二歲了。却有兩件不朽的事業：

1. 是和上大夫壺遂等定律曆，完成了太初曆。在这一年以前的曆法，是以冬天十月为歲首的，到了这年的夏五月，改訂曆法，以春正月为歲首，遂奠定了中國二千年來一貫采用陰曆的基礎。这种曆法，又不止是爭一个正月为歲首而已，晦朔弦望也都因經過这一次改訂而十分确切了。这种大改革，參加的人有三四十位，其中如公孫卿、儿寬、壺遂、唐都、洛下閎等，更是有名的專家。不过主动的还是司馬迁，所以他曾說：「余与壺遂定律曆」。（韓長孺列傳贊）以正月为歲首，本是夏代的曆法，孔子曾有「行夏之时」（論語衛靈公）的話，史記中也有「孔子正夏时，学者多傳夏小正」之文，这次就由司馬迁之手实现了孔子的理想而改用夏曆了。司馬迁本是世傳的歷史家，古代歷史家兼管星曆，他这一次大功劳，也实现了他父親那「上世典天官事，复为太史，則續吾祖」的期望。而也就可見史記的實和曆書之作，是有他的实际根据和价值的。

2. 是升始著史記。國家的曆法既然更新，既然开了一个新紀元，所以司馬迁的史記也「于焉著筆，」正如王國維所說的：「史公作史記，虽受父談遺命，然其經始則在是年，盖造曆事畢，述作之功乃始也。」（太史公系年考略）这时尚是他年富力强的时候。他遍歷了全國的名山大川，訪問了許多的民間長老，生活經驗是非常丰富的。現在都用來寫这部偉著——史記，当然会觉得寫不勝寫，而且寫得是那样順手，寫得是那样生动和确切的了。不过他的生活經驗虽然已經夠丰富了，但却还有一頁有名的李陵案，使他的生活更充实，更沉痛。

天漢元年（前一〇〇）司馬迁四十六歲了，仍为太史令，著述史記。这年武帝派苏武等出使匈奴，先是匈奴为了对漢朝表示好感起见，曾把从前所拘留的漢使郭吉、路充國等放了回來，也派了修好的使臣來。苏武之去匈奴也是把漢朝所拘留的匈奴使臣帶了过去的。可是匈奴的好意，并非真誠的，却仍然很傲慢，又因为漢的降將虞常要劫單于母闕氏归漢，事情發覺，而虞常又曾把这事告訴过和苏武同去的張勝，因此牽涉到苏武了，苏武自殺未死，終于把他迁到北海（西伯利亞貝加尔湖）無人的地方去牧羊，一直留了十九年才放回來。

天漢二年夏五月，武帝为了匈奴扣留漢朝使臣的緣故，对匈奴再用兵。这次的大將就是武帝所爱的李夫人之兄贰師將軍李广利；他

帶了三萬大軍，由酒泉出兵，击左賢王于天山。当时却有一个自負而急于單獨立功的人物出現了，這就是李陵。

當李廣利出發打匈奴了，武帝便又叫李陵去管輜重。可是李陵不高興作這樣屈居人下的事，便向武帝請求，他願意帶他的射法奇巧的兵士去當一面。武帝覺得他有胆量，便答應了。李陵遂帶了步兵五千人，从居延（宁夏北部）向北進軍，行了三十多天，直到浚稽山把營安下，把所經過的山川地形都畫了，使他的部下陈步乐來報告武帝。武帝見說李陵的兵士很肯效死，也便高興，陈步乐也因此拜了郎官。

可是不久李陵就遭遇了六倍以上的敵人，被包圍了。李陵看見情勢不好，打算突圍而出，因命他的步兵千弩齊發，匈奴大都應該而倒，其餘的則逃到山上去了。漢軍又追殺了數千人，單于大驚，又調了八万多騎兵來攻李陵。李陵一路戰，一路向南退却。一連又殺了敵人好几千。匈奴看看打得不利，便要收兵了。不料李陵的部下有一个刺探軍情的管敢，因为受辱而投降敵人了，他告訴匈奴：李陵實在沒有后援，箭也快完了，如果用精騎把他們射中了，就可以一氣解決。單于听了，便大胆帶騎兵再圍攻李陵。李陵的兵士，箭早已用完了，只拿了車輪的撐子作为武器，士兵死得更多，走也沒法走了。有人劝李陵暫時投降，李陵答道：「你叫我不死，這是不配称一个漢人的。」他于是把所有的旗子都毀了，把所有貴重物件都埋在地下了，他們正准備要突圍，后边追上來的敵人又是好几千。李陵覺得部下有四散而逃，逃到边塞上來的，只有四百余人而已，李陵战敗的地方，离边塞不过一百多里，边塞上便立刻報告了。

武帝本來的意思是希望李陵不成功便成仁的，听说李陵投降了，立即大怒。先是責問以前回來報信的陈步乐，步乐嚇得自殺了。又問其他众臣，也都嚇得沒有一个敢說李陵的好話的。只有問到司馬迁的時候，司馬迁却覺得李陵是一个「事親孝，与土信，臨財廉，取与义，分別有讓，恭儉下人，常思奮不顧身，以殉國家之急」的奇士，所以虽然彼此平素沒有什麼交情，既沒有飲過酒，也沒歡聚過，可是早已是神交着；加之這一次李陵之冒万死去赴公家之難，更喚起他的欽敬。而一般自私的只知道保全个人和一家老小的羣臣之隨聲誣傷，尤使他覺得伤心和不平；如果李陵就為一般達官貴人所不齒，倒也罷了，然而在他未敗的時候，凡有信使來，大家都是奉觴上壽，在武帝跟前夸贊李陵的，可是一到敗的消息來了，武帝的兴致完了，大家也就不開口了；司馬迁深知李陵的矢盡道窮，救兵不至，士卒死傷如積的苦况，也深知道李陵很得士卒的爱戴，就是到了這種絕境，只要李陵說一句話，士兵都是個個流着泪，帶着傷，張了沒箭的空弓，去和敵人的刀鋒去拚命的，司馬迁為這而感動着；他再不出來說話，是沒有人來說話的了，武帝的憂心也沒有人能給解慰了。他以為李陵素來和士兵大夫甘苦相共，能得兵士的死力，就是古來的名將也不能比得過他，現在他虽然陷落，然看他的意思，实在想要得一個適當的機會來報答漢朝，事已弄得無可奈何，然就他殺了匈奴那末多人來說，他的功勞也就不小了。司馬迁就用這個意思很誠坦地答复武帝的垂問。出乎他意料之外的，是武帝更大怒，認為司馬迁的話是給李陵講情，尤其疑心他在譏諷這一次功小的李廣利。因而武帝就把這熱心、多情、愛才的司馬迁交給獄吏了。

更不幸的是第二年（天漢三年）武帝听说李陵在教匈奴練兵，准備和漢对敌，（其实这不是李陵，乃是另一个降將李緒）益發怒不可遏，立刻把李陵的全家，母親弟弟老婆孩子，統統殺了。同时給司馬迁也受了腐刑。這在他是再奇恥大辱也不過的了。他覺得未嘗不可以自殺，可是他想到那部「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」的史記，還沒有脱稿，他于是「就極刑而無愠色」了。他這年四十

八歲，距他父親之死已有十三年，距他开始著述史記已有七年了。但受此刺激以後，想他更思如泉湧，筆如奔馬地加速完成起來了。太始元年，（前九六）司馬遷入獄後的第四年，他五十歲了。這年六月有大赦，他因此便出獄了，出獄之後，被任為中書令。中書令就是中官——宦官——而任尙書事的，是接受尙書之事而奏之于皇帝的。一切机密都要經過他的手，就官說，比太史令還闊一些，未嘗不可稱得起「尊重任職」（漢書本傳）的，但是他以為和宦者同官，實是莫大的恥辱，尙遠不及太史令了。當然他當中書令，不會忘了著史記，也許是寫得更勤快的时候了。

太始四年，（前九三）司馬遷五十三歲了，有報任安書。這是因為司馬遷當中書令尊重任職，所以任安給他的信，叫他推賢進士，殊不知他在悲憤之余，除了著述以外什麼心也沒有了，不是推賢進士的時候了。（史記田叔列傳后褚先生曰：「任安，榮陽人也。為益州刺史，又為北軍使者護軍，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，召任安與令發兵，安拜受節，入，閉門不出。武帝聞之，以安為佯邪，不傳事何也？任安答辱北軍錢官小吏，小吏上書言之，以為受太子節，言幸與我其鮮好者。書上聞，武帝曰：「是老吏也，見兵事起，欲坐視成敗，見勝者欲合從之，有兩心，安有當死之罪甚矣，吾嘗活之，今懷詐有不忠之心，下安吏誅死。」）案司馬遷為任安的朋友，任安死于衛太子的事情，在征和二年（前九一）遷報書則不知確系那一年。周壽昌漢書注校補卷四十一說：「劉屈氂傳云：「太子召北軍使者任安令發北軍，安受節已，閉軍門不肯應太子，后上聞，任安坐受太子節，懷二心要斬。」考衛青傳云：「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，輒得官爵，獨安不肯去。」顏注云：「安，榮陽人，后為益州刺史，即遣司馬遷書者。」據史公書，當即征和二年事。三年正月，上幸雍，故遷于二年季冬，即云从行也。距衛青死已十六年，安殆以益州刺史，入為北軍使者也。漢制，會冬決囚，報任安書云迫季冬，任安即于其时被誅矣。」王國維「太史公系年考略」于太始四年云：「案公報益州刺史任安書，在是年十一月。漢書武帝紀是歲春三月，行幸太山，夏四月，幸不其。五月，還幸建章宮。書所云會冬上來者也。又冬十二月行幸雍，祠五時，書所云今少卿抱不測之罪，涉旬薄从上雍者也。是報任安書作于是冬十一月無疑。或以任安下獄，受衛太子節，當在征和二年，然是年無東巡事，又坐他事。公報安書，自在太始末審矣。」王說很有理，所以列報任安書于太始四年。）

征和三年，（前九〇）司馬遷年五十六。這年李广利帶兵七萬，出五原击匈奴，兵敗而降。這是史記中所記最晚的事情，可信為出自司馬遷的手筆，偉大的史記當在這年著成功了。（史記原名「太史公書」，魏晉間才稱「史記」，）史記自序說：「凡百三十篇，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，藏之名山，副在京師，」書的字数都計算出來了，書是完成無疑的，而且「副在京師」，可見在生時已不止一個抄本。

司馬遷所以有這種成就，就在他有父親的教養，他有人民的立場，他有廣博的學問，他有敏銳的識力，他有朴素的唯物史觀，他周覽了中國名山大川，訪問了許多老百姓，有豐富的生活經驗；他因為李陵案而受腐刑，感到統治者的殘酷無情，感到人世的艱辛，使他更發憤，更埋頭著書了。這樣，就使他的史記不但成為中國二千年來史學的巨著，也成為二千年來文學的巨著了。

司馬遷可能就是在這一年死的，那末，他只活了五十六歲。

一 史記傳記的思想內容

史記這部偉大著作，不但是一部歷史名著，同時是一部感人最深，膾炙人口的文學名著，是一部博綜田間，兼擅文采，極富有現實主義的歷史文學。

史記全書的組織，分做十二本紀，十表，八書，三十世家，七十列傳，這是鄭樵通志總序所稱的「五體」。趙翼說：「司馬遷參酌古今，發凡起例，創為全史，本紀以序帝王，世家以記侯國，十表以系時事，八書以詳制度，列傳以誌人物，然後一代君臣政事，賢否得失，總彙于一篇之中」。(廿二史劄記，各史例目異同)所說頗為扼要，茲分別來談：

一、本紀以記載帝王的事跡，略仿春秋經傳的編年體。但也有精細的區分，十二本紀中：(一)合黃帝、帝顓頊、帝嚳、帝堯、帝舜最古的五個帝王為一本紀。(二)夏、殷、周以一朝代為一本紀。(三)將秦分為兩本紀，由秦國的祖先至秦國的滅亡為秦本紀；復秦始皇、二世事分為秦始皇本紀。(四)項羽、高祖、呂后、孝文、孝景、孝武，以一人為一本紀，共十二本紀。項羽入本紀，后人以為一本紀，或以一個人為一本紀，大約是因為歷史材料的多少來決定的。年代愈古則材料愈少，所以夏、殷兩代的帝王，往往無一事之可言，西周的王不載即位的年數；至秦始皇以後，才有詳細的記錄。今本孝武本紀與封禪書全同，殆是本紀遺失而後人以封禪書來補足的。且太史公自序作今上本紀而不是孝武本紀。王肅謂「漢武帝聞其述史記，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，于是大怒，削而投之，于今世兩紀有錄無書」(三國志王肅傳)。這當是事實，因為史記對於統治階級極盡諷刺的能事，這兩紀中當有更露骨的諷刺的話，觸犯了統治者的炎威，所以有錄無書了。

二、表 史記作十表：(一)三代世表，(二)十二諸侯年表，(三)六國年表，(四)秦楚之際月表，(五)漢興以來諸侯年表，(六)高祖功臣侯者年表，(七)惠景間侯者年表，(八)建元以來侯者年表，(九)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，(十)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。或為世表，或為年表，或為月表，皆以史料的多少而異。有人譏他煩費無用，但表的功用，在于節省紀傳中許多繁文，使人一目了然。故顧炎武說：「表所繇立，防于周之譜牒，與紀傳相為出入。凡列侯將相三公九卿，其功名表著者，既系之以傳，此外大臣無積勞亦無顯過，傳之不可勝書，而姓名爵里，存沒盛衰之迹，要不容以遽泯，則于表乎載之，又其功罪事實傳中有未悉備者，亦于表乎載之，年經月緯，一覽了如，作史體裁，莫大于是。」其後陳寿作三國志，范曄作後漢書，都沒有表，但后人補表之工作很多，尤以萬斯同歷代史表為最著。這就可以證明表的功用了。

三、社會文物演變的過程，非紀傳所能記載，故司馬遷創作八書：(一)禮書，(二)樂書，(三)律書，(四)歷書，(五)天官書，(六)封禪書，(七)河渠書，(八)平准書。在八書中，雖然不能包括一切文物制度，但關於主要的經濟基礎，我們在平准、河渠兩書及貨殖列傳中已能窺見其大略。封禪書可見歷代帝王的迷信和社會風俗。禮書多從荀子禮論篇及議兵篇鈔來，樂書多從禮記樂記中鈔來，但他在自傳中自謂「述故事，整齊其世傳，非所謂作」，則鈔錄前人之作，并不足為異。在樂書中也可以發現樂記中的錯